

“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

谢桂华

提要:利用 CGSS2008、2010 和 2011 年的数据,本文将目前城镇劳动力市场中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分为两个群体:经历了从农业户籍到非农户籍转换(农转非)的群体和未经历农转非的群体(出生时即为城镇户籍),并比较了这两个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相对于非农转非群体,农转非群体无论是在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还是在拥有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进一步的考察发现,这种优势并非存在于所有经历了农转非的群体之中,在幼年至青壮年时期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其未来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发展优于非农转非群体,而在青壮年期之后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则很可能成为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底层。我们因此得出结论,城镇户籍的开放可能只是有利于特定的群体。

关键词:农转非 年龄 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职业获得

2011 年是中国城镇化的一个标志性年份。这一年,城镇居住人口达到了 51.27%,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城镇人口超过了乡村人口。2012 年这一比例更是达到了 52.57% (张晓松等,2013)。然而这只是事物的一面,事物的另一面是户籍人口城镇化的滞后。自 2000 - 2010 年的 10 年间,城镇居住人口从 36.22% 提高到 49.95%,增长了近 14%;但同期城镇户籍人口则仅从 24.73% 增长到 29.14%,增长了不到 5%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2),这表明有超过 20% 的城镇居住人口持有的是农业户籍,因此目前的城市化也被称为“半城市化”(杨群,2012)。未来城镇化的方向则在于推进农业人口的市民化,做到城镇居住人口与户籍人口之间真正的统一,而户籍改革则成为未来城镇化的一个重要措施(徐绍史,2013)。那么,从制度上消除户籍壁垒是否就能够提升原农业户籍人口的社会经济地

* 本研究获得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移民视角下的劳动力流动研究”项目(08CSH017)资助。感谢匿名审稿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文责自负。

位,帮助他们融入城市生活?这是我们尝试在此回答的一个问题。

本文关注那些在过去几十年经历了从农业户籍到非农户籍转换(俗称“农转非”)的群体,比较了他们与城市非“农转非”人口的职业地位,借此探讨户籍壁垒的消除是否能够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地位,或者说,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我们期望本文的讨论能够有助于未来的户籍制度改革的设计。

一、“农转非”的选择性

迄今为止的许多研究发现,基于户籍制度的歧视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农民工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相对劣势地位(章元、王昊,2011),因此呼吁改革甚至废除户籍制度的呼声不断(胡星斗,2009)。那么户籍的转化或者并轨是否就足以提升农民工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达成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融合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将眼光转到那些曾经历过从农业户籍到非农户籍转换的群体身上(“农转非”群体),考察他们在农转非之后的社会经济地位状况,并以此探讨户籍转换对劳动力市场融合的影响。

大规模的城镇化开始之前的农转非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一种选拔性。农业户籍人口一般来说只能通过有限的几个途径,包括升学、招工和参军,转换为城镇户口(Wang,2005)。教育是一种智力的选拔,通过中专和大学招生等途径将农村的可造之材引入城市,并给予他们城镇户籍。招工也主要集中于年轻人。参军并不一定就能自动获得城镇户籍,士兵只有通过提干等有限途径才能获得城镇户籍。因此,这些方式实则都具有选择性。研究也证实:教育水平、党员身份和参军经历都会显著性地提高农村人口农转非的概率(Wu & Treiman,2004)。

自1997年以来,许多地方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户籍转换的限制,^①满足一定条件的农业户籍居民可以自由申请转换为城镇户籍,主要的审核标准包括购房、创业、稳定的工作和缴纳一定年限的社会保

① 1997年6月,国务院批转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和关于完善农村户籍管理制度的意见》,各地选择382个小城镇试点,两年间办理城镇户口超过50万(何伟,2001)。

险等。此外,有些地方将教育水平作为审核标准,一定教育程度之上的申请人即可以获得当地城镇户口。不过,虽然获取城镇户籍的限制放松了许多,但它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筛选措施,那些有一定经济基础或者人力资本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城镇户籍。例外的是当地农民,他们可以通过征地等方式转化为城镇户籍。因此总的看来,城镇户籍的授予并非一个随机的过程,选择性依然存在,农业户籍中那些拥有相对优势的人更容易获得城镇户籍。但“优势”只是相对于持有农业户籍的人口来说。一旦获得了城镇户籍,与一出生就拥有城镇户籍的人相比,他们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是否依然拥有优势?

已有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一方面,经历了“农转非”的人员,总体上其向上流动的机会甚至大于出生时即获得城镇户籍的人群,我们暂且称之为“农转非的优势”;但另一方面,那些14岁时依然是农业户籍的“农转非”人员日后的发展却不如14岁时拥有城镇户籍的人群,后者包括出生时即为城镇户籍的人口以及14岁之前成功“农转非”的人群(吴晓刚,2007)。这表明,不仅是否“农转非”是影响研究对象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重要变量,并且“农转非”时的年龄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或者说“农转非的优势”很可能受年龄的影响。

这个研究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与对国际移民的研究不谋而合。国际移民研究中根据移民自己或者父母的出生地将其划分为不同的代际。国外出生的人被定义为第一代移民,父母为国外出生、自己本土出生的人被定义为第二代移民,而父母为本土出生的人被定义为本土(第三代或以上)居民。此外,第一代移民中,那些在18岁以前迁移的人又被称为第1.5代^①(Zhou,1997)。

比较不同代际的移民在输入国的表现,研究者发现,移民子女相对于非移民子女在学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就这些移民在青少年时期的学业表现和心理健康的分析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第1.5代移民(即成人之前随父母一起迁移的人)的总体表现,无论是学业还是心理,都远远优于本土青少年,而第二代移民相对于本土青少年的优势则缩小了(Kao & Tienda,1995; Hao & Woo, 2012)。

研究者将移民子女在学业上的种种优势归因于移民的选择性。第

① 对第1.5代移民的定义因研究者而异。在0-4岁时迁移的人被认为更接近于第二代移民,而13-18岁时迁移的人则更多地具有第一代移民的特征(Zhou,1997)。

1.5 代和第二代移民的父母作为主动选择迁移的人群具有很多的特质,比如富有冒险精神、有很强的成功动机、对未来的生活期望比较高,相对于本土居民来说更希望也更信奉通过个人的努力来改变命运。一方面,这些父母强烈的成功动机和信念可以传导给孩子,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对孩子学习成绩的期望值更高,在督促孩子的学习上也更加不遗余力。这些使得移民子女在输入国学校的表现相对非移民子女来说更加成功,由此形成了移民子女的优势(advantages for children of immigrants)(Kao & Tienda,1995; Hao & Woo,2012)。

移民子女在学校成功是否能够延续到职场上,并最终带来他们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优势,目前还没有见到相关的跟踪研究。根据对澳大利亚 1981 年的人口数据的研究发现,控制了其他变量之后,本土出生居民的收入比海外出生的高 7%。但差距的大小随着定居年限而变化,定居时间越长,差距越小。不过这个研究并未提到迁移时的年龄的影响,只是说,如果海外出生的人口的各种收入回报与本土居民一致的话,他们的收入将比后者高 4%,其中英语技能是关键因素(Chiswick & Miller,1985)。对美国第二代移民的研究发现,他们的收入比本土居民的子女高 5%(Chiswick,1977)。此外,对成年前迁移加拿大的移民与本土居民的收入回报的比较研究发现,儿童时期移民的人,他们的教育回报等同于本地人。迁移时年龄越大,教育的回报越低。作者由此推断出在海外所接受的教育回报低于在迁入国所受的教育(Schaafsma & Sweetman,2001),但迁移时的年龄是如何影响到迁移者的社会经济地位则不是很清楚。总而言之,这些研究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迁移的年龄很可能对收入具有显著性影响,因为迁移时年龄越小,则相对的定居年限就会越长,英语技能也很可能相对越高,更可能在迁入国接受教育,教育的回报也更有可能接近本土居民,也因此更有可能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赶上或超过本土出生的居民。

当我们把眼光转回到国内的“农转非”问题时,首先注意到的是“农转非”并不等同于移民。移民首先是指地理位置的转移,而“农转非”,虽然也被视为是一种从农村向城市的迁移,但首先是制度身份的转换,是户籍性质的转换,以及依附在户籍制度背后的各种社会待遇的转变,它可能涉及、也可能不涉及到地理迁移。但与移民类似,这个群体(无论是农转非群体还是迁移群体)不是随机选择的结果,很可能存在着选择的优势,即那些更优秀者、或者更富有冒险精神者、更有进取

心者,有更大的可能性获得农转非的机会或者选择迁移(吴晓刚,2007;Chiswick,1999)。其次,农转非群体与移民群体都将面临生活环境或者生活方式、制度环境的转变,有一个重新适应与融入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也许可以借鉴相关移民理论,来探讨农转非群体(或者群体中的某一部分人)相对于没有经历农转非的城镇户籍人群是否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存在着某种优势(我们称之为“农转非优势”),以及这种优势是否与农转非时的年龄相关。

根据既有的一些研究发现(吴晓刚,2007),我们首先可以提出一个相对比较粗略的假设,即: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转非”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职业获得的几率都高于非“农转非”群体。

其次,在“农转非”群体内部,“农转非”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有可能因农转非时的年龄的不同而不同。因为身份或者环境转换时的年龄越小,越能更好地适应新环境。基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14岁以前农转非的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职业获得上都优于14岁以后农转非的群体,并在这个基础上做进一步的推论,农转非时的年龄越小,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就越高,获得管理技术性岗位的几率也就越高。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农转非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与他们农转非时的年龄呈负向关系。

那么,与生而具有城镇户籍的人群相比(非“农转非”群体),在不同年龄段经历农转非的群体是否在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上均享有优势(如果存在优势的话)?也就是说,是否各个年龄阶段农转非的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均高于非农转非群体?因为没有相关的研究,我们暂且这么假设。

二、数据与方法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中国人民大学数据调查中心采集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数据(CGSS)。^①这个调查涵盖了全国所有18岁及以上人口。由于每年调查中符合条件的样本有限,我们将2008年、2010年和

^① 数据的抽样方案详见《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09)。

2011年收集的3个横截面数据统和起来使用。这3个年份的总样本量分别为6000、11785和5620。我们的研究对象为介于18-59岁、目前居住于城镇并且拥有城镇户籍的在业居民,包括曾经历了“农转非”以及出生时即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文中把前者称为“农转非”人员,后者称为本地城镇人口或者非农转非人员。

此处我们借用被访者的职业地位来衡量其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于此有两种方法:其一是考察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①。但由于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是基于世界上许多国家的职业地位而构建的,某些方面很可能不太适用于中国的情况(比如ISEI中,法官这个职业被赋予了最高的指数),因此我们又使用了职业获得来做验证分析。

也就是说,本文的因变量包括2个:一是被访者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ISEI),二是职业获得。后者将被访者的职业分为2大类:管理技术类职业(包括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业、事业单位负责人和专业技术人员)和非管理技术类职业(包括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业从业人员、农林牧渔从业人员和生产和运输设备操作人员及有关人员)^②。

本文的自变量为“农转非”经历。一是是否经历过农转非,为虚拟变量。二是农转非时的年龄,为分组变量,即根据迁移者获得城镇户籍时的年龄段,将他们分为6大类:非农转非人员(出生时即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③),1-13岁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幼年组,6岁以前农转非的样本很少,因此不再细分),14-17岁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青少年组),18-24岁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青年组),25-35岁时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壮年组),以及35岁以后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④。

因为本文的样本涵盖当前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所有拥有非农户籍的人口,他们中一部分人很可能并不拥有本地户籍。因此为了控制户口和流动的效应,我们根据户籍和流动信息将被访者分为本地出生人口、户籍迁移人口(户籍迁入本地)和流动人口(拥有外地户籍)。

本文的其他控制变量包括被访者当前的年龄、性别、教育状况、父母

① 原数据给出了职业的ISCO88代码。ISCO88与ISEI的转换代码见 Ganzeboom & Treiman, 1996。

② 把所有的职业分成2类,而不是保留多个类别,是为了区分职业地位的差异。

③ 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于1958年(Cheng & Selden, 1994),因此本研究中将那些报告在1958年或以前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6个样本)也视为原城镇人口(即生而具有城镇户籍的群体)。

④ 18-24岁是很多人接受高等教育时的年龄;35岁是很多工作招工时设置的年龄限制。

的教育状况,以及个人当前的迁移状态。个人的教育状况分为4类:小学或者以下,初中,高中以及中专、技校,大专或以上。父母的教育状况则取父母中最高教育程度者,分为4类:文盲、小学、初中、高中或以上。^①

根据因变量的性质,本文建立了2个基本模型,分别对2个因变量做出统计估计。因变量 ISEI 为连续型变量,因此模型1为线性回归模型。 X_i 代表“农转非”经历(或者“农转非”时的年龄),为一系列虚拟变量。 Z_j 代表各控制变量。

$$ISEI = \alpha_1 + \beta_{1i}X_i + \gamma_{1j}Z_j + \varepsilon_1 \quad (1)$$

因变量职业获得为虚拟变量,因此模型2为 logistic 模型。模型左边的 P 代表被访者获得管理技术类职业的概率。

$$\log \frac{p}{1-p} = \alpha_2 + \beta_{2i}X_i + \gamma_{2j}Z_j \quad (2)$$

本研究在方法上存在的一个瑕疵是样本选择问题。因为很多研究发现,就农业户籍人口来看,农转非群体并不具有随机选择性,或者说,农转非群体不能代表其来自的农业户籍群体。但由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来考察获得农转非机会的概率,并由此控制样本的选择性,因此我们的样本只包括那些获得了农转非机会的群体,而舍弃了那些未经历农转非、目前依然拥有农业户籍的群体。也因此,我们的研究只适用于推论到目前城镇劳动力市场上已经拥有城镇户籍的群体,而无法推论到所有的农业和非农户籍劳动力,特别是那些未来有可能经历农转非的群体。^②

三、农转非群体的特征

我们从3个 CGSS 调查中共获得 5566 个合乎条件的样本,其中来

① 父母的最高教育程度与被访者教育程度的分布特征不同,因此分类也不一致。例如,父母中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占比很高,因而单独成为一类(对于被访者,则归入“小学或以下”),而接受过大专或以上教育的则比较少,因而与高中教育合为一类。

② 匿名审稿人提出可以用倾向值匹配法来解决此处的样本选择性。这里的问题是:虽然目前已有学者尝试使用倾向值匹配法(或者其他方法)探讨农业户籍人员和农转非人员之间的选择性问题(郑冰岛、吴晓刚,2013;Zhang & Treiman,2013),但本文期望探讨则是农转非人员和出生即拥有城镇户籍群体之间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社会经济地位方面的融合倾向,因此需要把出生即拥有城镇户籍的群体带入到讨论之中,同时对3个群体做倾向值匹配;然而,多群体的匹配技术目前还不成熟(胡安宁,2012)。

自于2008、2010和2011年的样本各占31.5%、47.6%和20.9%，男性占有所有样本的56.4%。^①由于一些调查中的权重系数还不是很完善，因此下面的统计分析没有考虑到权重，只是对所使用数据的一个简单的考察，不能由此推导出总体的状况。

在所有具有城镇户口、并且居住在城镇的在职居民中，经历了农转非的人占有所有样本的38.61%（见表1），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76.17%）是在18岁之后获得的城镇户口。农转非人口获得城镇户籍时的平均年龄为23岁。幼年时期（6岁以前）经历了农转非的人口非常少，只有34人，所以我们在后面的分析中将这部分人与少年时期（6-13岁）农转非的人合并为一组考察。

表1 获得城镇户口时的年龄分布

	百分比	累计百分比
出生时即为城镇户口	61.39	61.39
6岁以前	.61	62.00
6-13岁	2.86	64.86
14-17岁	5.73	70.59
18-24岁	16.89	87.48
25-35岁	8.26	95.74
35岁以后	4.26	100.00
总计	100.00(5566)	

注：括号内数字系样本量，表2、3、4同此。

从户籍地来看（见表2），88.61%（60.53% + 28.08%）的样本拥有当地城镇户籍（包括当地出生人口和户籍移民两部分）。外地户籍人员，也即流动人口，只占研究对象的11.39%。无论是农转非人员还是非农转非人员都以当地户籍为多，只是内部分布还是不太一样。非农转非人员以当地出生的人为主，从外地迁移过来的人总共占24.91%（13.23% + 11.68%），其中13.23%的人获得了当地户籍。而农转非群体以外来人口为主，62.64%（51.70% + 10.94%）的人是从外地流

^① 由于本文期望探讨的是户籍壁垒的消除与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职业融合，因此样本只包括了农转非人员和出生即为城镇户籍的群体，未包括农业户籍人员，因为其与前两个群体无论是在自变量、控制变量还是因变量方面的分布差异太大。

人,其中有 51.70% 的人获得了当地户籍。因此可以说农转非群体在很大程度上与迁移人口是交叉的,只是其中更多的是正式迁移人员(得到了当地户籍)。

表 2 样本的流动状况 单位: %

样本分类	农转非人员	非农转非人员	总计
当地出生人口	37.37	75.10	60.53
户籍移民(获得当地户籍)	51.70	13.23	28.08
流动人口(拥有外地户籍)	10.94	11.68	11.39
总计	100.00(2149)	100.00(3417)	100.00(5566)

所有样本的平均年龄为 38.8 岁,经历过农转非和未经历过农转非的人群在平均年龄方面未见显著差异,前者为 38.7 岁,后者为 38.9 岁。性别分布中,37% 的男性和 40% 的女性经历过农转非,女性的比例稍高于男性。

从教育程度看(见表 3),我们的样本(居住于城镇并拥有城镇户籍的在职人口)的教育程度有些偏高。^① 所有样本中,大专及以上学历教育程度的超过了 40%,并且经历过农转非和未经历过农转非的两大群体在教育程度方面的差异主要表现在高中教育程度或者以下。相对而言,经历过农转非的人群的教育程度呈现两头高的趋势,低教育程度的人(初中或以下)所占的比例高于未经历过农转非的人群,而高教育程度的人群(大专及以上学历)所占的比例也略高于未经历过农转非的人群。

不过,两个群体在父母的教育程度方面显示了差异(见表 4),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反映了农村人口和城镇人口的教育差异——因为农转非人口的父母多是居住于或者来源于农村,而出生时即拥有非农户籍则常常意味着父母中至少有一方居住于城镇。

① 我们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表 B0403b)计算出城市 16 岁及以上的就业人口中,小学及以下教育程度的占 8.8%,初中、高中、大专和大学本科及以上的分别占 39.6%、25.3%、14.3% 和 12.0%。不过这个数据是基于城市居住人口计算的,因此包括了所有居住在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由此可以推导出,居住在城市并且拥有城镇户籍的就业人口的教育程度分布相应会更高一些,但由于没有相关数据,无法得知其具体的分布。

表 3 教育程度分布 单位: %

教育程度	农转非人员	非农转非人员	总计
小学及以下	9.59	3.72	5.98
初中	23.08	20.40	21.43
高中	25.83	36.03	32.09
大专	20.43	19.99	20.16
大学本科或以上	21.08	19.87	20.34
总计	100.00(2149)	100.00(3417)	100.00(5566)

表 4 父母最高教育程度分布 单位: %

教育程度	农转非人员	非农转非人员	总计
未接受过学校教育	18.55	11.47	14.20
小学	36.82	26.95	30.76
初中	21.98	25.72	24.28
高中或以上	22.64	35.86	30.76
总计	100.00(2129)	100.00(3391)	100.00(5520)

就因变量的分布看,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的平均社会经济指数为 47.2,比未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46.1)高 1 个百分点。此外,40% 的农转非人口和 36% 的非农转非人口目前从事技术类职业。因此,在未控制任何变量的情况下,农转非群体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似乎略高于非农转非群体。

四、户籍转换与社会经济地位获得

我们建立了 2 组模型来考察户籍转换状况以及户籍转换年龄对城镇居民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见表 5)。第 1 组模型(模型 A1 和 B1)考察的是各自变量对社会经济指数的影响,第 2 组模型(模型 A2 和 B2)考察的是对职业获得的影响。每组模型又包括 2 个分模型:模型 A 系列(A1 和 A2)考察了户籍转换(是否农转非)的效应,模型 B 系列(B1 和 B2)则考察了农转非年龄对被访者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表 5 户口转换和户口类型对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

变量	社会经济指数		职业获得	
	模型 A1	模型 B1	模型 A2	模型 B2
男性	-1.113 *** (.348)	-1.141 *** (.348)	.029 (.065)	.027 (.065)
年龄	.217 (.134)	.191 (.134)	0.025 (.025)	.024 (.025)
年龄平方	-.001 (.002)	-.000 (.002)	-.000 (.000)	-.000 (.000)
教育程度				
初中教育	4.372 *** (.807)	4.049 *** (.813)	1.168 *** (.273)	1.139 *** 0.274)
高中教育	10.384 *** (.797)	9.910 *** (.811)	2.194 *** (.267)	2.151 *** (.269)
大专教育	19.989 *** (.847)	19.463 *** (.864)	3.287 *** (.271)	3.239 *** (.273)
本科及以上学历	26.792 *** (.865)	26.249 *** (.882)	4.132 *** (.275)	4.082 *** (.277)
父母教育				
小学	.760 (.563)	.695 (.563)	.088 (.114)	.084 (.114)
初中	0.911 (.627)	.867 (.627)	.256 ** (.122)	.252 ** (.122)
高中或以上	2.163 *** (.629)	2.159 *** (.630)	.345 *** (.121)	.344 *** (.122)
缺失	1.129 (1.931)	1.112 (1.930)	.056 (.383)	.046 (.384)
流动状况				
户籍迁移	.900 ** (0.435)	.781 * (.436)	.187 ** (.080)	.182 ** (.080)
流动人口	1.079 * (.565)	1.009 * (.565)	.163 (.102)	.160 (.102)
农转非	1.510 *** (.400)		.272 *** (.074)	
农转非年龄				
1-13 岁		2.020 ** (.963)		.309 * (.171)
14-17 岁		1.613 ** (.767)		.262 * (.139)

续表 5

变量	社会经济指数		职业获得	
	模型 A1	模型 B1	模型 A2	模型 B2
18 - 24 岁		2.145 *** (.517)		.321 *** (.094)
25 - 35 岁		1.430 ** (.676)		.225 * (.132)
35 岁以后		-1.144 (.909)		.084 (.200)
样本量	5566	5566	5556	5556

注: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2) * $p < 0.1$, ** $p < 0.05$, *** $p < 0.01$ 。

模型 A 系列的结果证实农转非群体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拥有相对优势(见表 5:A1 和 A2)。曾经农转非的人群,无论是在社会经济指数方面还是在职业获得方面,都高于那些出生时即拥有城镇户籍、未经历过农转非的人群。经历过农转非的人比出生时即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在社会经济指数方面显著性地高出 1.51 分(模型 A1),在获得技术性职业的几率方面高出 31% [$(e^{0.272} - 1) \times 100\%$, 模型 A2]。

当把被访者获得城镇户籍(农转非)时的年龄细化后(模型 B1),我们发现,农转非的优势效应并非是一成不变的。35 岁以前(包括 35 岁,下同)经历农转非的人在社会经济指数方面的优势非常明显,特别是在 18 - 24 岁之间农转非的群体,其社会经济指数比参照组(非农转非人口)高出 2.145,是所有组中最高的。而在 35 岁之后才经历农转非的人在社会经济指数方面则不具备任何优势。

此外,拥有优势效应的各农转非年龄组之间虽然在社会经济指数方面有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这否定了我们对农转非的年龄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关系的假定(我们假定,农转非时的年龄与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成负向关系)。统计发现,幼年和青壮年时期(35 岁以前)获得城市户口的人群,无论其获得城市户口时的年龄大小,都具有类似的优势。这些优势,既可以被解释为父母较高的期待效应(成年以前经历农转非的人群),也可以解释为自我的努力(18 - 24 和 25 - 35 岁组)。移民研究认为,自主选择迁移的人在总体中并不具有随机性。他们有一些共同特征,比如积极主动性、努力适应性等等(Chiswick, 1999)。那些幼年和青少年时期经历农转非的人群,他们大

我是因为家庭的原因而获得了农转非的机会,而他们的家人具有与移民类似的一些禀赋,对子女的期望值比较高,希望通过子女完成自己在迁入地的融合过程。对于那些依靠自己获得农转非机会的人(青壮年时期获得农转非的机会),很多是通过了一定的选拔过程,比如升学、就业等而获得了这个机会,因此他们也很可能比城市的当地人更有能力或主动性更高。而年龄比较大时获得农转非机会的人,可能更多的属于政策性农转非(比如征地拆迁等),因此他们的农转非是非竞争性的结果,他们身上所具有的一些类似移民的优势相对较小,也因此其社会经济地位不仅不比城市当地人高,甚至可能更低。^①

我们用职业获得代替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来考察农转非经历的效应时获得了类似但不完全相同的结果(模型 A2)。职业获得变量被转换成了管理技术类职业(白领)和非技术类职业(蓝领)的二分变量。一方面,总的看来,农转非群体的管理技术类职业获得几率高于非农转非群体(模型 A2)。另一方面,当引入农转非时的年龄之后(模型 B2),35岁以前获得农转非机会的各年龄组,在获取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方面依然显著性地高于未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并且各年龄组之间的差异并不具备统计显著性。壮年之后(35岁以后)获得城镇户籍的群体,其获得技术类职业的几率与未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相比并不具备优势,但也没有明显的劣势,二者的差异没有统计显著性。

研究结果说明,虽然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农转非群体总体上比非农转非群体拥有一定的优势(模型 A1 和 A2),但其内部并不是同质性的,农转非的年龄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到他们日后的发展前景。那些在幼年和青壮年时期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在城镇劳动力市场上的成绩优于非农转非群体;而在35岁以后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口与非农转非群体相比则并不具备优势。这个发现也否定了我们此前的假定(各个年龄段农转非的群体与非农转非群体相比,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均具有优势)。

在控制变量方面,对于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来说,还存在着“移民优势”。相对于出生于本地的、拥有本地城镇户籍的人群,那些从外地流入并获得了当地户籍的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要高出约0.9(模型

^① 有研究提出,政策性“农转非”与高度选拔性的“农转非”在收入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后者的收入甚至高于非农转非群体(郑冰岛、吴晓刚,2013)。

A1),获得管理/技术性职业的几率高出约21%(模型B1);而外地流动人口(未获得当地户籍)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则高出1.079,获得管理技术性职业的几率高出约18%。后两个群体之间的差异均不具显著性。也就是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外来人口(无论是否拥有本地户籍)在社会经济地位方面都要高出本地出生的人口,这与对农民工的研究发现非常不同,但却在某种程度上验证了对城镇户籍流动人口的研究结果(段成荣、孙磊,2011;章元、王昊,2011;李骏、顾燕峰,2011)。^①

性别的效应很有意思。对城市劳动力市场上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力来说,在控制了其他变量的情况下,男性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显著地低于女性,然而二者在获取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上却没有显著差异。年龄无论是对社会经济地位指数还是职业获得都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会显著地提高一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和获取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一个人的教育程度越高,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与获得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也越高。此外,只有当父母的教育水平达到高中或以上之后,他们的教育程度才会显著地影响到孩子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不过,就孩子获取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来说,小学教育程度的父母与未接受过教育的父母相比没有显著差异。但对于接受了小学以上教育的父母来说,其孩子获得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会显著性地提高,并且父母的教育程度越高,孩子获取管理技术类职业的几率也越高。

五、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比较了城镇劳动力市场上,曾经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和未曾经历过农转非的城镇户籍拥有者在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差异,进一步证明了农转非群体在城市职场上的相对优势,即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上享有充分的发展机会。与未曾经历过农转非的城镇户籍群体相比,经历过农转非的群体更有可能获得管理/技术

^① 其他研究中的城镇户籍流动人口只包括目前不拥有当地户籍的人口,不包括那些发生过户籍迁入的人口,因此与本研究在研究对象的分类上有所不同。

性职位,并且职业的社会经济地位指数也更高。

此外,获取城镇户籍时的年龄对“农转非的优势”有一定的影响。一方面,相对于未经历过农转非的城镇户籍拥有者,35岁以前获得农转非机会的人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但35岁以后再经历农转非的人则不具有这种相对优势。另一方面,农转非时的年龄并不与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呈负向关系,并非是农转非时越年轻,未来的社会经济地位获得就越高。35岁以前获得农转非的人,无论具体获得时间是14岁以前、18岁以前还是20多岁以前等,其在水社会经济地位获得方面的差异都不具有显著性。

先前的研究曾经发现,14岁以后经历过农转非的人在向上流动机会方面不如那些在14岁时即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吴晓刚,2007),但由于后者包括那些出生时即获得城镇户籍的人和14岁以前经历过农转非的人这两个群体,而前者的年龄涵盖范围又非常大(所有14岁以后农转非的群体),因此难以辨析是否只有14岁以前农转非的群体才享有“农转非的优势”,以及是否所有14岁以后经历农转非的群体都享有相对劣势。而我们的研究一方面严格区分了农转非人口和非农转非人口,另一方面细化了农转非时的年龄并进行分组测量,因此,我们把农转非的优势从可能的14岁的界限推进到了35岁的分组界限。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当前的城镇化运动可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城镇化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非农化,一方面需要把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劳动中转移出来,另一方面需要实现非农转移出来的人口与原城镇人口的融合,这样的融合首先需要消除户籍身份方面的壁垒,实现社会待遇方面的统一。那么户籍壁垒的消除本身是否有效?又对什么样的人群有效?我们的研究发现,在控制了其他因素的情况下,在比较年轻时期获得非农户籍的人口,其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不输于那些生于城市的同类群体。也因此,目前的青年农民工,如果能够获得城镇户籍的话,至少从职业地位方面他们不仅是有可能实现与原城镇人口的融合,甚至可能会超过后者。

当然,我们的结论或许有些乐观,因为原来的农转非很多是选择性的结果,农村里一些相对比较优秀的人更有可能获得农转非的机会,而以后的城镇化则是比较大范围的,会降低或者改变农转非的选拔性质。不过对研究样本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在25-35岁范围内实现农转非的群体,有超过65%的人是通过征地、家属随转以及户籍改革等非选拔

性措施而获得的城镇户籍,他们在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表现总体来说也并不弱于那些生来具有城镇户籍的同类群体。另一方面,我们的样本中有超过36%的人是在1997年之后,即城镇化速度加快之后获得的农转非机会,而他们之中又有超过44%的人是通过升学、就业等具有选拔性的措施获得的农转非机会。所以说,今后的城镇化,即使是规模更大、速度更快,也不可能是完全随机性的结果,总是存在着一定的条件和选择性。2013年12月,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人民日报,2013),这即是一个涉及到选择性的政策,因为已经转移到城镇的、有能力在城镇就业和生活的人口是自愿流动与城市接纳双重选择的结果。因此可以说,这个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是适用的。

此外,我们的另外一个发现,即幼年时期获得农转非机会的人群,其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也不弱于出生于城镇户籍的人群,则可以揭示,长远地看,城镇化时社会经济地位方面处于弱势的人群可以通过代际转换,也就是在他们的下一代身上,实现与城市社会的融合。

当然,由于本研究是基于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即对过去几十年实现农转非群体的研究,因此研究结论还需要进一步的验证。

参考文献:

- 段成荣、孙磊,2011,《流动劳动力的收入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编,2012,《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 何伟,2001,《小城镇户籍改革》,《人民日报》9月17日。
- 胡安宁,2012,《倾向值匹配与因果推论》,《社会学研究》第1期。
- 胡星斗,2009,《中国户籍制度的命运:完善抑或废除》,《学术研究》第10期。
- 李骏、顾燕峰,2011,《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中的户籍分层》,《社会学研究》第2期。
- 人民日报,2013,《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12月15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3-12/15/nw.D110000renmrb_20131215_1-01.htm)。
- 王美艳,2005,《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就业机会与工资差异——外来劳动力就业与报酬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第5期。
- 吴晓刚,2007,《中国的户籍制度与代际职业流动》,《社会学研究》第6期。
- 徐绍史,2013,《国务院关于城镇化建设工作情况的报告》,中国人大网(http://www.npc.gov.cn/npc/xinwen/jd gz/bgjy/2013-06/27/content_1798658.htm)。
- 杨群,2012,《城市化率过半,要警惕“半城市化”》,《解放日报》5月23日(http://newspaper.jfdaily.com/jf rb/html/2012-05/23/content_809386.htm)。

- 张晓松、杜宇、江国成,2013,《人到哪去? 钱从哪来? 地怎么管: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回应社会“三大关切”》,《人民日报》12月15日第2版。
- 章元、王昊,2011,《城市劳动力市场上的户籍歧视与地域歧视:基于人口普查数据的研究》,《管理世界》第7期。
- 郑冰岛、吴晓刚,2013,《户口、“农转非”与中国城市居民中的收入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第1期。
-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项目,2009,《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报告(2003-2008)》,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
- Cheng, Tiejun & Mark Selden 1994, “The Origins and Social Consequences of China’s Hukou System.” *China Quarterly* 139.
- Chiswick, Barry. R. 1997, “Sons of Immigrants: Are They at an Earnings Disadvantage?”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7(1).
- 1999, “Are Immigrants Favorably Self-Selected?”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2).
- Chiswick, Barry. R. & P. W. Miller 1985, “Immigrant Generation and Income in Australia.” *Economic Record* 61(173).
- Ganzeboom, Harry & Treiman Donald 1996, “Internationally Comparable Measures of Occupational Status for the 1988 International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Occupations.”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5.
- Hao, Lingxin & Han S. Woo 2012, “Distinct Trajectorie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re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dvantaged?” *Child Development* 83(5).
- Kao, Grace & Marta Tienda 1995, “Optimism and Achievement: The Educational Performance of Immigrant Youth.” *Social Science Quarterly* 76(1).
- Schaafsma, Joseph & Arthur Sweetman 2001, “Immigrant Earnings: Age at Immigration Matters.” *The Canadian Journal of Economics* 34(4).
- Wang, Fei-Ling 2005, *Organizing Through Division and Exclusion: China’s Hukou Syste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Wu, Xiaogang & Donald J. Treiman 2004, “The Household Registration System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In China: 1955-1996.” *Demography* 41(2).
- Zhang, Zhuoni & Donald Treiman 2013, “Social Origins, Hukou Conversion, and the Wellbeing of Urban Residents in Contemporary China.”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42(1).
- Zhou, Min 1997, “Growing Up American: The Challenge Confronting Immigrant Children and Children of Immigra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3.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闻翔

upon absorbing rural youth labor. However, the fertility rates in China have been very low over the years, so that fewer children and population aging are very prominent for both urban and rural population. As the results, labor supply capacity of the rural population has been rapidly eroded, rural population is no longer infinite labor source, and the previous pattern of age selective urbanization is no longer sustainable. Therefore, changes of age structure and the rapid population aging must be recognized and taken into full account in the formulation of urbanization policy.

Estimation on the Target Family of the 2-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and the Relevant Problems in China

..... Zhang Liping & Wang Guangzhou 25

Abstract: After more than 30 years of the only-child policy, China has a great amount of only-child families. Using the 1% sample data of population survey in 2005 and the census data of 1990, 2000 and 2010, we take the target population of the new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s research goal, and simulate the population structure of 2010 and set up a simulating data base for 2010 by computer. From the simulating data base, we estimate the population size and structure of the fertility women of the 2-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by rural and non-rural, and east, middle and west regions. We find that about 14 million families will be covered by the new 2-child policy for only-child parents. The mainly target families concentrate in the east part of China; the number of families is about 7 million, and there are about 5.3 million non-rural families among these families. There are 4 million and 3.2 million target families in the middle and the west respectively. The authors also analyzed the possible problems posed by the new policy and proposed some policy suggestions.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after Obtaining Urban *Hukou*

..... Xie Guihua 40

Abstract: Using the data from CGSS2008, 2010 and 2011, this research divides labor force in urban labor market with urban *hukou* into two groups: group born with urban *hukou* (urban natives) and group gained urban *hukou* after birth (*nongzhuangfei*). The paper compares the two groups' socioeconomic attainment, including socioeconomic index and occupational attainment, and finds that *hukou* migrants own a certain degree of "migrants or *nongzhuangfei* advantages": they have relatively higher socioeconomic index as well as better chance in getting skilled jobs. Further exploration shows that this kind of migrant advantages does not distribute evenly among people who have experienced *hukou* migration. People who obtained

urban hukou after middle-age actually fall into the bottom of urban labor market. Therefore, we conclude that the urban *hukou* opening policy which is called for during current urbanization movement can only bring benefits to part of people who have non-urban *hukou*.

PAPER

Capital with Faith: A study on the charitable giving behavior of Wenzhou private entrepreneurs *Zhou Yi & Hu Anning* 57

Abstract: Utilizing unique data from a survey on private entrepreneurs in Wenzhou, and guided by Weber's dual interest-driven model and "switchman" hypothesi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and the differing patterns in the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 of Wenzhou's private entrepreneurs. Some basic research findings include: (1) both political faith and religious faith could positively motivate business owners to donate, yet (2) different kinds of faith have different impacts on where, how, and to what results donations are directed, and the variety of choices highlight a high degree of affinity between faith and material interests; (3)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within enterprises form an institutional milieu external to the business owners' authority and are able to affect their ideal interests, and consequently affect their charitable donation behavior; however, this effect is limited.

Guanxi and Strategy: The daily stratagems of the Chinese *Zhai Xuewei* 82

Abstract: Strategy, bred by the Chinese culture, is consistent with the mode of thinking of Yin and Yang. The meaning of studying strategy not only lies in the complicated contents or schemes of strategy, but also because it is different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Western social science methodology and epistemology. On the one hand, studies on the Chinese strategy should focus on how strategy is used for people's self-interests; on the other hand, scholars should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ole of strategy in adapting to social structure. Because the Chinese culture assumes that the heart-mind of human beings can be commonly understood, and the daily social interactions of the Chinese are long term-oriented and lowly selective, therefore, the interactive strategy of the Chinese is harmony-oriented and favor and face are emphasized in daily life. Finall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game theory is far from enough in studying strategy in the Chinese context.